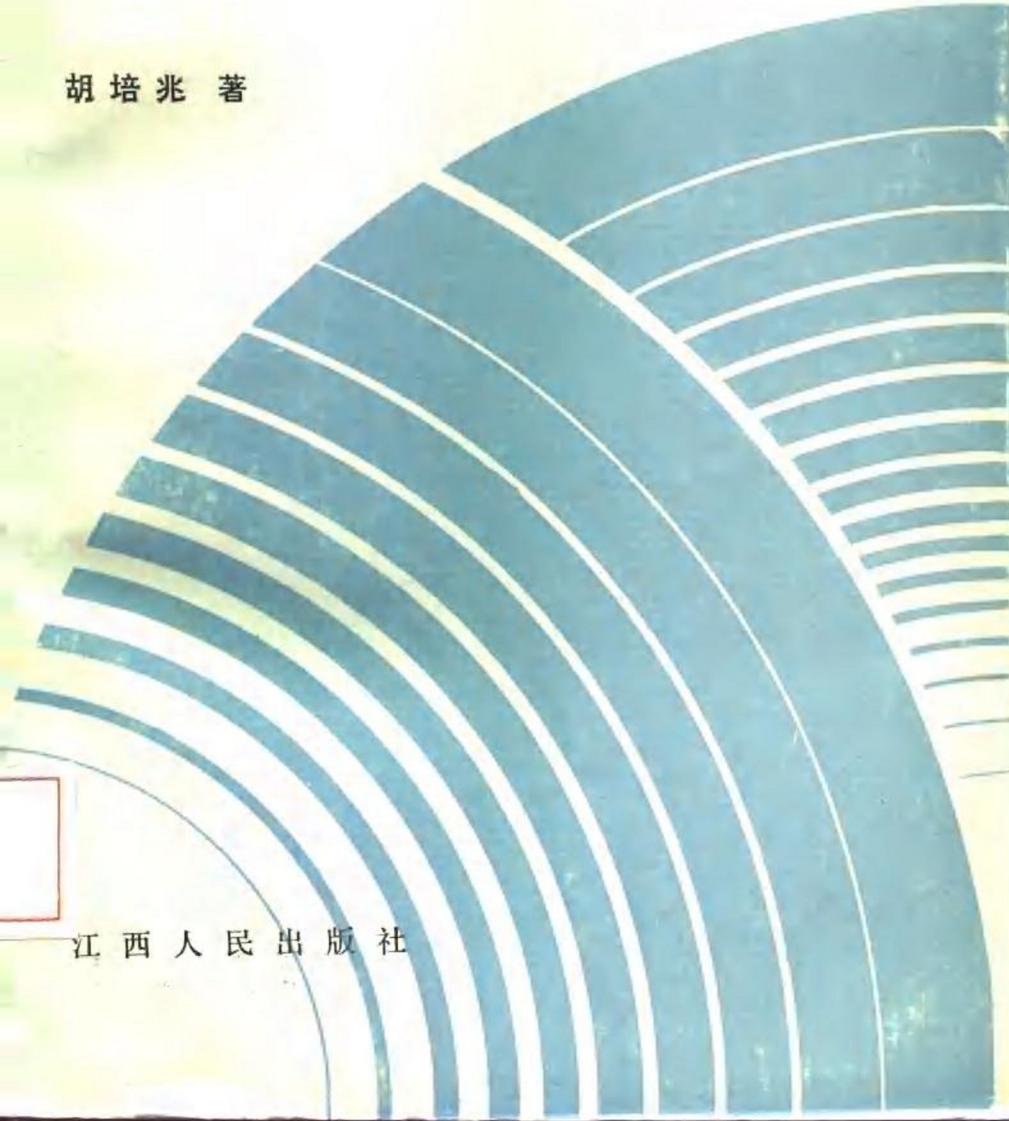


中青年经济学者论著丛书

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胡培兆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青年经济学者论著丛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胡培兆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4万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
统一书号：4119·38 定价：2.15元

内 容 提 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尚在初创时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提高和发展，促其逐步成熟。本书就我国经济学界经常争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颇为精辟和独到的见解。如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不能教条式模仿《资本论》，其研究起点不应该是《资本论》的研究起点，而应该是它的研究结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社会占有制，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剩余产品的归属上；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既是主人，又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就必须绝对服从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商品成本应该是包括一切劳动支出的大成本，把活劳动支出排除在成本之外，只会导致活劳动的浪费；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为本位，任何企业、单位、个人的合理收入只能以自身的劳动收入为限；按劳分配运动的轨迹是两条曲线；奖金不应承担物质刺激的主要作用，等等。这些见解作者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自成一家之言，可供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

本书文笔流畅，颇富文采，读之引人入胜。

序　　言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还很短，并且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里以不同模式异步实践着，尚未在全世界或多数国家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要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不成熟阶段建立成熟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的同志说，“直到现在，一部比较令人满意的，系统地、全面地论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专著，还没有写出来。”“几十年来外国和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领域内所做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完整地建立起来的程度”^①。这样估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建设不免会刺痛一些著作家的心，然而是符合事实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吃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还要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没有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对经典作家的理论也是吃不透的。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需要怎样来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只有极原则的预示，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示我们。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出现以前始终是个抽象的东西。列宁说：“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

① 于光远：《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历史研究》，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仍然是一种抽象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①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尝试。就在这种不断的尝试性的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各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建立起能比较真切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科学社会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主观臆造与发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仅仅在于把资本主义必然要向更高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历史必然性，予以科学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承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更高社会形态，自然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经济上集中表现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更高技术基础上，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无政府状态消除了，代之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劳动者的贫因为前提的生产过剩危机消除了，代之以社会经济的不断高涨和劳动人民一批接一批、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共同富裕；人剥削人的现象消除了，代之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以勤劳致富为荣。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必然会使全体劳动者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去，各尽所能，奋发向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然而，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是十分

^①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546页。

曲折的。“左”的、右的和传统的观念阻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习惯以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和古人憧憬的“大同世界”等同起来。在所有制上不切实际地追求“一大二公”；在计划体制上喜欢大统大闹，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用有限财力物力大闹土跃进、洋跃进；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相结合而以平均主义为主的分配方法，强调同步富裕，结果出现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懒散、依赖的惰性现象。于是，在理论上加深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破除已往的各种偏见，是十分必要的。

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精蕴，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长期任务。我国经济学界为此已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分歧很大，几乎对每个经济原理都有很多争论，而且难有了期。这一方面表示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很不彻底，需要广泛深入研究。近几年来，我也跻身于其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并先后在《中国经济问题》、《经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十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见解，其中不少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的“百家争鸣”栏等介绍过。所论虽然不免浅陋，但尚能自成一家之言，如关于建立大成本范畴的论述、关于按劳分配两条曲线的论述、关于劳动力的生产责任制是按劳分配直接原因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要重视价值生产的论述、关于衡量消费水平高低的享受消费率的论述、关于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关键在于消除企业惰性经营的论述、关于价值规律是革命规律的论述，等等，都不曾为他人所涉及。本书就是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扩写成

的。意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决不抱舍我非理的成见。对一些经济规律，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是否存在，我深表怀疑，但没有充分论据可以证实这种怀疑时，我在本书中还是把它们作为客观规律来论述。

本书中的有些专题是在谢佑权教授的直接帮助下写成的。张亦春、周元良、陈振羽、孙连成同志也给我不少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对学校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工作处所。要是没有贤内助黄福仙，我几乎无法完成这个和其他著作。她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而且还帮我收集资料，几乎耗尽了她的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本书的实际合作者。如果认为这是妻子（或丈夫）应尽的义务而无需提及，那是封建的世俗观念，是极不公平的。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写于厦门大学白城新村

目 录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

生产关系 (1)

(一) 一个误解仍在继续 (1)

(二)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独立的科学的研究 (7)

(三) 要消除生产关系研究中的“左”的影响 (12)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 (18)

(一) 确定一个理论体系研究起点的原则 (19)

(二) 《资本论》研究的结论可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起点 (23)

(三) 作为研究起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逐步建立
起来的 (30)

(四) 对《资本论》的体系切忌教条式的模仿 (34)

三、我国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生产资料

社会所有制 (39)

(一) 在所有制问题上引起种种非议的理论根源 (39)

(二) 现阶段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 (42)

(三) 实践已证明社会所有制的存在 (46)

(四) 全民所有制必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 (50)

(五) 人民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剩余产品的归属上 (53)

(六) 国家所有制与官僚主义并不相容 (58)

(七) 全民所有制优越性的发挥关键是要消除惰性经营 (61)

四、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 (66)

(一) 生产目的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幸福 (66)

(二) 产品生产还需要采用商品生产形式	(71)
(三) 生产过程的特点	(74)
(四) 生产过程的表述	(78)
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计划工作	(82)
(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82)
(二) 商品经济的特性之一就是活跃	(90)
(三) 价值规律是革命规律	(93)
(四) 计划经济要通过计划工作来实现	(102)
(五) 计划调节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主要手段	(109)
(六) 市场调节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副手	(113)
六、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重视价值生产	(118)
(一) 一个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118)
(二) 不能以产品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商品经济	(120)
(三) 重视价值生产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124)
七、社会主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	(129)
(一)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至今没有摆正	(129)
(二) 社会主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二重地位	(133)
(三)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	(139)
八、社会主义使用机器的界限	(145)
(一) 废除了旧的界限，又有新的界限	(145)
(二) 从实践中来看社会主义使用机器的界限	(148)
(三) 迎接技术革命与注意机器使用界限并不矛盾	(154)
(四) 掌握界限，争取主动	(157)
九、社会主义的成本理论	(160)
(一) 成本价格是资本家的不合理的范畴	(161)
(二) 成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同样是不合理的	(164)
(三) 社会主义的成本论应该是价值论	(169)
(四) 利润、成本亏损率	(174)

十、社会主义不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	(177)
(一) 生产价格不是生产力范畴	(178)
(二) 生产价格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范畴	(181)
(三) 生产价格根源于资本本性	(183)
(四) 生产高度社会化只是助成生产价格形成 的物质条件	(187)
(五) 社会主义商品应以价值为订价基础	(191)
十一、按劳分配是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的分配制度	(198)
(一) 按劳分配的出现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198)
(二) 劳动力生产的责任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205)
(三) 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与按劳分配同义	(209)
(四) 按劳分配运动的两条曲线轨道	(216)
(五) 现阶段只能基本实现按劳分配	(220)
(六) 奖金不该起物质刺激的主要作用	(225)
(七) 要记取贯彻按劳分配的历史教训	(228)
十二、要保障合理的个人物质利益	(235)
(一) 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界限	(235)
(二) 劳动者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革命和建设 的动力之一	(239)
(三) 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正确途径	(243)
十三、劳动致富是社会主义原则	(247)
(一) 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为本位	(248)
(二) 个人和集体的收入只能以劳动收入为限	(251)
(三) “万元户”之富并非来自横财	(255)
(四) 对个体经济要指导、帮助和监督	(257)
十四、正确处理土地级差收益是发展我国农业 的一个重要问题	(261)
(一) 土地级差收益是客观存在的	(261)

(二) 土地级差收益应归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所有	(264)
(三) 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是实现级差收益的条件	(272)
十五、社会主义开创人民消费的新阶段	(278)
(一) 人民消费的性质和特点	(279)
(二) 人民消费的分类和变化趋势	(282)
(三) 衡量消费水平高低的享受消费率	(285)
(四) 鼓励消费就是鼓励生产	(288)
(五) 商业工作要力求人民消费接近完全消费	(292)
(六) 消费品生产要创造新需求	(298)

附 录

一、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范畴只有一重性	(301)
——评卓炯同志的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这样的探索	(316)
——读于光远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探索(一)》	
后记	(326)

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仍然是生产关系

对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我们已在拙著《〈资本论〉研究之研究》中阐述过自己的见解。这里我再申论两点。

（一）一个误解仍在继续

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生产力，甚至主张把生产力列为“首要”对象，我认为这是在继续前人的一个误解。

大家马上会想到那个被斯大林批评过的雅罗申柯同志。他是五十年代初强烈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代表。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①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有两点。一点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束缚”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已没有这个“束缚”作用了，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另一点是：在社会主义

^① 转引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页。

制度下，生产关系已不复独立存在了，它已被生产力所“吞没”。他说：“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①，当然也就没有再作独立研究的必要。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种，一种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柯的这种观点，斯大林认为是“大错特错”的，已作了全面分析和否定。这里不再转述。我只指出一点，雅罗申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误，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已不存在问题，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全部任务或主要任务是如何合理组织生产力，促其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完全被忽视了。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他误解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雅罗申柯的这个误解经斯大林否定以后，在形式上已消除了，可是实际上仍然还在继续着。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唯一对象已不可能了，因为错误太明显，但又不想完全抛弃，总要为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对象中争一合法席位。于是，由单一的生产力对象论重新回到历史上的双重对象论那里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九二五年，苏联经济学家C·贝索诺夫就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对象论。他说：“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所以应该并列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因为这两个方面

^① 转引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页。

都列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物质生产。”^①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多的同志也是主张这个双重对象论的。其中有的同志是主张以生产力为“首要”对象的双重对象论。有的同志质问：“既然我们承认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那末，怎么能够把生产力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呢？”“如果社会科学不研究物质生产，将来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还干什么呢？”^② 另有的同志承认“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又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生产力的生产力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生产力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有决定作用。”因为“在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刚建立时，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故没有产生专门研究生产力的经济学。现在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了，生产单位和生产部门的生产联系十分紧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政治经济学就要求有一个专门研究生产力的经济学作为自身的基础。”^③ 实际上，这是以生产力为“首要”研究对象的观点换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这种双重对象论观点，我提出两点不同意见：

第一点，唯物史观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双重研究对象论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① (苏)阿·古兹尼耶夫：《从历史上考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经济译丛》1960年第2期。

② 熊映梧：《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江汉论坛》1982年第2期。

③ 唐昌黎：《生产力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去认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才能把握其本质和运动规律。特别是直接研究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一刻也不能超脱社会生产力这个基源来谈生产关系。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同时研究生产力，甚至必须“首要”研究生产力，那末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把生产力列为自己研究对象或首要研究对象了。写小说绘画也要先描绘生产力状况。这岂不是把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等同起来了么？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主张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的同志说：“我主张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力，决不是说不研究生产关系，或者不重视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认为应当在研究生产力基础上来探讨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性。”^①这就与我们走到一块来了，没有分歧。因为这里说的已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方法论了。实际上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过去是说应该把生产力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现在是说研究生产关系要“首先研究生产力”，把生产力从研究对象转到研究手段和基础上来了。这就和通常说的研究生产关系要紧紧联系生产力来研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是这样，就是坚持生产力“对象”说也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点，政治经济学需要生产力经济学为基础的理由，就根本不通。表现在逻辑不通上面。持政治经济学需要生产力经济学为基础这种观点的同志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包括进去，从研究对象来判断，不能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基础。”^② 我可以用

① 熊映梧：《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江汉论坛》1982年第2期。

② 唐昌黎：《生产力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同样逻辑予以否定：“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生产力不能把生产关系包括进去，从研究对象来判断，不能认为生产力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限度内，有决定意义的是定性分析。因此，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是更为本质的东西。要是这两门科学果真有联系的话，那末与其说生产力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毋宁说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作用，不能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作用混同起来。此其一。其二，持政治经济学需要生产力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这种观点的同志的理由是：“不研究生产力，孤立地去研究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也就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从本体论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从认识论来看，应先研究生产力而后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①。这话当然是对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步也不能离开生产力。但是，这位同志认为政治经济学在过去因为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没有生产力经济学，因此也就不需要生产力经济学为基础。现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都很高了，就需要以生产力经济学为基础了。这个判断与前提不是矛盾了吗？从本质论和认识论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基础作用，不论过去和现在，也不论生产力水平是高还是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的政治

① 唐昌黎：《生产力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经济学可以不同呢？明明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包括进去”，为什么又说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包括生产力的研究呢？干脆说，过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包括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已变得复杂，但仍然要以生产力的研究为理论基础，这样说不是更明了吗？这种观点虽然说得曲折，实际上还是不脱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力为“首要”对象的双重对象论，只是理由似乎显得更牵强和脆弱。

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一些同志为什么要把生产力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呢？我以为他们除了继续前人的误解外，又有新的误解。一方面他们把党的工作重点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等同起来，以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重要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也就应该跟着转移到生产力上来了。这是对形势和党的政策的一种误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各门社会科学的服务重点或服务方向当然也要转移，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但不是要求我们去转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政治经济学而论，在四化建设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很多，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模式？为什么体制改革同样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些阻力该怎么消除？革除吃“大锅饭”的旧管理体制以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管理体制？迎接世界技术革命应该调节哪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如何利用外资？等等，这些都属于生产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繁重得很。把这些问题都研究解决好，就是对党的工作重点的最好服务。如果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这些问题，而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就是不务正业。另一方面，他们把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误解为就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